

“第四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 高端论坛”综述

高晓波

为了进一步深入推进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2019年11月15—17日,“第四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会议由贵州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贵州师范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承办。来自全国51家科研院所的80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入选参会论文共70篇。论坛围绕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外交、文艺、医疗、科技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一、政治史

抗战大后方政治史研究主要围绕国共两党的政治建设、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构建、国共话语权争夺、国民政府地方政权建设、抗战动员等问题展开讨论。

关注抗战大后方国共两党基层政治建设的论文有贵州财经大学李飞龙的《断线的风筝:贵州地区中共组织的建立、发展与革命活动(1933—1935)》和红河学院赵旭峰的《抗战时期国共后方建设比较研究——以贵州省与陕甘宁边区为例》。前者考述了1933—1935年贵州地区中共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后的发展和革命活动,后者对国共两党的后方建设进行了比较研究。此外,西南政法大学耿密的《抗战时期川康建设期成会对大后方基层吏治的观察与反应》认为川康建设期成会对治理川康地区基层吏治建设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西南大学赵埜均的《烽火中的圣人——抗战期间各方面对孔子的纪念、争夺与诠释》论述了抗战期间日本和汪伪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孔子的纪念及对孔子思想解释权的争夺过程。重庆工商大学洪富忠的《抗战时期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构建——基于周恩来的人际网络视角》将中共政策的抽象意象与周恩来的具象进行了有机的融合。空军工程大学岳恒的《若即若离:西安事变前后国民政府与地方派关系之探析》探讨了国民政府与地方派若即若离的关系。重庆师范大学何凯的《略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以四川省第十一区专署为中心的考察》论述了20世纪40年代初重庆国民政府对四川省第十一区专署进行大规模县级政区调整的动因和过程。贵州师范大学杨钧期的《从阿拉善旗专员到军事专员:战时南京国民政府介入蒙旗地方政治的尝试》也论述了中央政府介入边疆阿拉善旗地方政治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德明的《全面抗战初期中国知识界的抗战认识探析》认为知识界人士关于抗战认识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振奋了民族精神,大后方宣传与动员是中华民族团结一

致,共同御敌的重要体现。西北师范大学李海群的《抗战时期新疆的民众动员和抗战宣传——以西北国际通道为中心》考述了新疆政府和社会组织深入各区县民众开展筑路动员和宣传,以及民众响应维护国际通道的过程。南京师范大学张若愚的《国防最前线:抗战时期绥远省西部的民众动员》认为傅作义在战时开展民众动员、稳固后方,重铸了政府的统治根基。西南大学王瑞的《战时首都重庆的五四纪念与抗战动员》提出抗战时期重庆各界通过追忆五四,从强调青年的时代重任和使命等方面进行抗战精神动员。也有学者探讨了政治人物的抗战观,如安徽大学轩艳青的《读书与救国:抗战时期冯玉祥的读书生活》考述了冯玉祥在抗日时期读书生活中的修身自勉、关心时政、服务抗战三个方面。

二、经济史

大后方的经济支撑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大后方经济在本次论坛备受关注,主要内容涉及交通运输、土地田赋、粮食生产、内债收入、缉私金融、城市建设、商会建设、黄河治理等。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为了保证战略物资运输的畅通,加快公路建设的步伐。云南师范大学滇西抗战史研究所杨瑞璟、毕家丰的《抗战时期拟筑中印公路南线勘测述论》,考察了重庆国民政府对修筑南线公路的内部讨论和实际勘测过程。兰州财经大学研究团队以地理考证和走访调研方法,考证了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西北国际交通线建设情况,参会论文包括张静、胡金野的《安西与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齐磊、张静的《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永登段地位与作用略论》,以及胡金野、齐磊的《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中的西兰公路甘肃段》。

土地是中央政府财政税收的来源,粮食供应是战争取胜的关键,战时缉私则起着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研究抗战大后方的土地田赋、公产整理、粮食生产、合作缉私等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些方面的参会论文有:贵州师范大学安尊华的《论抗战时期贵州田赋征实》、重庆工商大学曾崇碧的《抗战时期四川公学产整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段易成的“寓救济于生产”:抗战时期云南华侨垦殖研究(1937—1945)》、浙江师范大学王荣华、郑王荟的《抗战时期全国粮食会议研究》、贵州师范大学高晓波的《抗战时期西南“省际互助缉私”述论——以川滇黔三省为考察中心》等。

此外,参会论文还涉及大后方经济互动、内债收入、华侨投资、“纸荒”问题、银行金融、城市建设、商会组织建设、糖厂统制、黄河治理等方面。如贵州财经大学刘岩岩的《抗战时期西南西北大后方的经济互动——以川陕为中心》、西南大学高蓉芳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债收入地位再研究》、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吴元的《抗战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研究(1931—1945)》、华中师范大学齐远飞的《造纸与抗战:战时大后方“纸荒”问题及其应对》、上海师范大学陈礼茂的《全面抗战时期交通银行的内迁及其在内地的业务发展》、大理大学赵善庆的《抗战时期大后方商会组织之形塑——以云南为中心》、江汉大学王肇磊的《略论抗战时期西南苗疆城市市制的初步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刘超建、马从心的《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对糖业统制的实践——以广西糖厂的分析为中心》、陕西理工大学鲍梦隐的《抗战黄河掘堵史研究述评》等。

三、社会史

大后方社会史反映了民族抗战背景下社会变迁的历史。本次论坛内容主要涉及城市的娼妓、城市外籍人员管理、毒品治理、社会生活、难民救济、城市扩建等大后方社会治理问题。

重庆国民政府为了提升抗战能力,对社会基层存在的影响抗战大局的娼妓、烟毒、难民救济等

社会问题进行了治理。南京财经大学李飞的《陪都重庆的娼妓问题及治理》认为重庆市政府推行集娼制,对公娼实施统一管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西北师范大学侯培和的《西北抗战大后方烟毒治理及绩效——以甘肃省为例》认为在南京国民政府治理烟毒的禁烟法令下达后,甘肃省政府制定地方禁烟计划,且效果明显。西北师范大学张少凯的《抗战时期贵州难民医疗救济研究》认为贵州在抗战时期开展救济工作,积极救治患病难胞、灾民,为抗战做了重要贡献。

抗战大后方城市研究重点关注城市治理及市民生活。西南大学谢健、李冰冰的《变动社会中的区域发展与城镇治理——以全面抗战时期的北碚为中心》,认为重庆北碚当局采取了机构改革、城市改造与扩建,增强了城市治理。贵州师范大学宋祖顺的《抗战时期重庆公园建设与市民生活初探》认为,政府力图把重庆公园建设成为市民躲避轰炸的重要避难所和抗战宣传、闲暇游乐的重要场所。西北师范大学尚季芳的《用文字和影像记录西北:抗战时期艺术家郑君里的西北之行》,考述了艺术家郑君里一行用文字和影像记录抗战时期西北民众社会生活的过程。

对侨民管理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北京师范大学张乐的《在断交与宣战之间:珍珠港事变前夕国民政府对德意籍传教士的管理》认为重庆国民政府为保障德、意华侨之利益,对德、意籍传教士采取了较为适中的管理政策。此外,山东师范大学包爱芹的《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侨务期刊对侨教问题的探讨宣传》认为侨刊在宣传发展华侨教育、增强华侨民族意识、增进海外侨胞对祖国的向心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民间社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四川师范大学王雪梅的《抗战时期同乡组织功能的变化——以旅渝同乡会为例》认为大后方的同乡会也为抗战时期的社会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此外还有学者探讨抗战大后方的社会民变问题,如九江学院龚喜林的《农民的生存困境与抗战时期大后方民变探析——以“黔东事变”为中心》认为“黔东事变”是湘黔边区农民为争取生存权进行的反抗国民党的民变,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抗战的力量。

四、教育史

抗战爆发,东部、中部的教育机构内迁大后方,继续完成教育使命。本次论坛的教育问题研究,主要涉及抗战时期学校的内迁安置、学校生活与思想教育、教育如何服务抗战等方面。

教育科研机构内迁安置是教育延续的前提。眉山市委党校罗杨的《李庄乡绅罗南陔》考述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内迁安置过程中地方乡绅的应对。贵州理工学院谢晓博的《大夏大学师生在黔日常生活》尝试从衣、食、住、行四个角度,勾勒大夏师生在黔的生活状态。首都师范大学宋永林的《抗战大后方校园生活的多维图景——以〈齐鲁大学校刊〉为中心的考察》考察了身处大后方的齐鲁大学校园生活的具体状态。重庆市委党校左小强的《无差别轰炸下的学府生态:以重庆大学为例》论述了重庆大学面对日军轰炸威胁采取的防空举措。

抗战背景下,教育发展也体现了为抗战服务的理念。南京大学何鑫的《大学服务抗战事业的探索与成效——以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创设和发展为案例(1935—1945)》中提到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成为抗战时期大学服务国家助力抗战的典型代表。浙江大学庞毅的《从“读书”到“从戎”——抗战时期竺可桢关于大学生救国的思想转变及其原因》分析了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的大学生救国思想。云南师范大学张睦楚的《试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师范生暑期教育服务及其开展——以“生活教育团”为中心之探讨》以“生活教育团”为核心讨论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师范生的暑期教育服务及其开展情况。陕西师范大学谢飞的《抗战时期新疆社会教育与政治动员研究》论述了新疆政府在抗战时期利用社会教育,采取多种措施实施政治动员的过程。此外还有探

讨学校和地方合作关系的研究成果,如云南师范大学胡天银、封海清的《共识与合作:论战时西南联大与云南地方政府关系(1938—1945)》认为西南联大在滇办学期间,云南地方政府为其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物质保障,西南联大同样为云南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五、军事外交史

军事外交在抗战大后方研究中举足轻重。本次论坛在军事方面主要围绕日军大轰炸、抗战动员及宣传、征兵军婚等问题展开;外交史研究讨论的主题是中印交通线、国家借贷等活动。

为了打击消磨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日本多次对重庆、西安等大后方主要城市轮番轰炸,但并未动摇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西安邮电大学袁文伟、李柏桦的《抗战时期日军无差别轰炸陕西述略》认为陕西民众在日军的轰炸中通过建立防空组织,开展防空宣传等措施,有效地增强了防空意识,捍卫了自己的家园。西南大学吴光会的《〈纽约时报〉对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惨案的报道探析》分析了《纽约时报》对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惨案的报道。

征兵、军婚纠纷等军队建设问题是抗战大后方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福建医科大学兰雪花的《抗战时期福建兵役机构与征兵工作述论》考证了抗战时期福建的兵役机构及征兵工作情况。曲阜师范大学韩晓燕的《抗战大后方军婚问题及政府因应——以重庆地区为中心》针对抗战大后方的军婚纠纷问题,考察了重庆国民政府建立的较为严密的军婚保障体系。

外交问题的相关论文中,百色学院韩继伟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过境印支运输外交磋商述评》考述了中国通过与法国磋商,保证了援华物资借道印支通道的外交活动。四川外国语大学李靖的《战时中法外交关系的“空窗期”——中方视角的探讨》论述了抗战时期中法外交关系的演变历程。

还有学者围绕战争战略和借款外交问题展开讨论,如西南大学林坤的《武汉会战的战略组织机制研究》、复旦大学王钊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关于广梅铁路借款的中英交涉》。

六、文艺、医疗、科技史

文学、艺术一直是抗战大后方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次论坛参会论文涉及抗战时期文学空间的探讨、音乐史研究、文化交流、抗战遗址文化保护等方面。南京晓庄学院张谦芬的《空间理论视域下抗战时期文学空间的重新考察》提出抗战时期同一民族的文学作品有着极为突出的异域同声及殊途同归的现象。西南大学汤斯惟的《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综述》认为抗战音乐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政治斗争中诞生、艰难的转折以及突出重围的新生。重庆师范大学龚永红的《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中外音乐文化交流》认为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众多音乐文化团体、院校、民间音乐组织积极开展了文艺抗战和“音乐外交”活动。贵州师范大学赵莹莹的《娱乐·媒体·民族主义——以重庆〈木兰从军〉被焚事件引起的纷争为中心》探讨《木兰从军》事件背后大后方电影业的复杂生存样态和独特的政治文化生态。广西出版传媒集团陆璎的《寻找消逝的战争踪迹——贵州抗战遗址考察》对贵州抗战遗址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保护利用的对策和建议。

抗战中官方及知识精英也以文化运动、创建艺术研究所、开展全民体育等形式为抗战做出贡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贵州师范大学李周峰的《“唤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抗战时期顾颉刚的文化使命》、盐城师范学院孙宗一的《高一涵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建》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孟浩的《边城欢哨:抗战时期贵阳的体育竞赛与公共生活》。

医疗及科技史成为本次论坛关注的新亮点。湖南师范大学张金艳的《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

护士征调政策探析》对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的护士征调政策出台及其演变过程、护士征调政策的实施和影响进行了考述。中国科学院王公的《抗战中的军医学校营养研究所》对军医学校营养研究所的创立过程、重庆国民政府在军医院中开展的对伤病员的营养保障计划等进行了考证。中山大学李锐洁的《学以致用：国民政府的战时营养改进（1937—1945）》从科技社会史的角度分析了战时营养改进运动，认为重庆国民政府利用营养科学知识构建权威的知识谱系，应对战时粮食危机。

若干思考

综上所述，本次论坛从研究内容看，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依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社会生活史、文艺教育史研究正在兴起，同时出现了科技史研究的新亮点；从史料来源看，参会论文挖掘了数量可观的档案资料，又通过实地调查搜集了诸多口述史料。从研究视角看，注重微观研究；从研究队伍看，参与单位广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抗战大后方研究。

本次论坛推动了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步伐，对发掘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有重要意义。未来抗战大后方研究任重而道远，还需要转变研究理念、拓宽视野、挖掘史料、拓展领域。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潘洵在总结本次论坛的基础上对未来深化抗战大后方研究提出了四点思考：（一）进一步转变抗战大后方研究的理念，要凸显全民抗战的主旨，深入研究中部及西部人民是如何支持支援抗战的；（二）拓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视野，突破“抗战大后方是国民党或重庆国民政府的大后方”的传统思维定式，由政党视野转向全民视野，强调大后方各民族共同抗战的全民性；（三）强化抗战大后方的史料挖掘，系统全面地整理专题史料，做好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四）拓展抗战大后方的研究领域，聚焦服务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注重现实关怀。

[作者高晓波，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来特）



The CPC's Responses to the Betrayal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adres in North China Resistance Base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Yang Dong, Li Gelin (51)

The cruelt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is well known, so it is inevitable for any Party to have a minority of defectors and traitors. However, the betrayal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ersonnel in the North China Base Areas of the CPC showed different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regions and groups. The defections of a small number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ersonnel to the enemy were, of course, incompatible with the disciplinary requirements of the Communists and even contrary to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mmunists. Therefore, the CPC paid great attentions to the methods of dealing with the defectors. In the contradiction and entanglement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defecting to enemy" was almost the expression of mutual recriminations of both sides. The Kuomintang accused the CPC from the angle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s rule, while the CPC refuted i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national war of resistance. Because the CPC timely made correct contingency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deal with problems, the defection of a few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ersonnel in the North China Base Areas did not affec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PC's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On the contrary, the CPC wa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werful under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spirit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Kuomintang's Works of Arming Civilians in Guangdong under "Military-Civilian Cooper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Guangdong People's Anti-Japan and Self-defense Corps Li Hao (68)

"Showa Trading Company"—A Company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Japanese Army during the War Guo Xunchun (80)

"War! There is War Everywhere!"—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n Goebbels Diary Peter Harmsen (93)

The complete diary of Joseph Goebbels, the Nazi German Propaganda Minister, was only used by historians in recent years. Previous important articles and books on German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have failed to use this historical material.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problem: to what extent the publication of new materials in Goebbels diary will correct the past views about the extent of Germany's involvement in the Far East crisis. The article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Hitler's role in decision-making in 1937, and gives concrete evidence that the German dictator turned to pro-Japanese position, which was actually earlier than previous speculation. In addition, Goebbels diary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Hitler's view of East Asia by Nazi ideology was perhaps far more beyond previous estimates.

Paper and War: Paper Shortage and the Social Responses in Sichuan during the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Lu Xuming (103)

The Studies on Opium Invasion Policies in the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after the War Wang Meiping (120)

Commentary on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by Arthur N. Young Wu Jingping (132)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War Mobilization and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en Yan (138)

A Summary of the Sino-Japanes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artime Mobilization in East Asian—Impact and Heritage" Gao Shihua (142)

A Summary of "The Fourth High-level Forum on the Study of the Great Rear Area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Gao Xiaobo (147)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he Studi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for Seventy Years" Zhang Yan, Yan Yong (152)

General Table of Contents, *The Journal of Studies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2019* (157)